

诚如孟森先生所说,“藏乱则与准噶尔相呼应,准部不平,西事终为患”。清朝自十七世纪后期以来西陲不平的祸根,全在准噶尔部。雍正帝对准噶尔的战争没有成效,“为失败之兵事”。弘历最初对准噶尔采取议和之策,设防于哈密、乌里雅苏台(今蒙古国境内)。乾隆十年(1745年)噶尔丹策凌死后,准噶尔部内乱不止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同属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摆脱准噶尔部控制,内迁至乌里雅苏台,归附清朝。至此,平定准部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清朝两路进兵,攻取伊犁,并在伊犁东南的格登山大胜。不久,准噶尔汗达瓦齐被擒,阿睦尔撒纳降。同年八月,阿睦尔撒纳复叛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阿睦尔撒纳败死在俄罗斯,准噶尔部完全平定。准部既平,准部所控制的天山南路的回疆进入到乾隆帝的视野之中。他决定让曾被准部扣为人质的回部两和卓木(即布拉敦和霍集占)回到南疆招服回众。大、小和卓木回归故土后,遂以叶尔羌(今新疆莎车)及喀什噶尔(今新疆喀什)为基地密谋割据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小和卓木霍集占杀害清朝前往招抚的副都统阿敏道,正式叛清。两年后,大小和卓木被巴达克山汗索勒坦沙诛杀,回部戡定。应该说,所谓“十全武功”不像弘历自诩的那样顺利,其间战事多有挫折,如对缅甸的战事其实并没有取得胜利,最终也只是议和了事。不过,乾隆帝开拓边疆的努力却是值得称颂的。《清史稿》对乾隆帝的赞誉也主要集中于此,所谓“开疆拓宇,四征不庭”。况且,武功并非乾隆帝边疆政策的全部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颇富传奇色彩的回族“香妃”以和贵人的身份入宫,备受宠爱,后来升为容妃,成了乾隆帝与回部贵族之间的亲情纽带。在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的木兰围场,乾隆帝还曾盛情款待了率领17万蒙古土尔扈特部众从俄罗斯返回祖国的渥巴锡汗。

《清史稿》在“开疆拓宇,四征不庭”的评价之后,紧跟着“揆文奋武,于斯为盛”八字,以奖励了弘历的文化事业。乾隆帝的文治之中,最让人称道的是《四库全书》的修纂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乾隆帝下谕收集古今群书,“四库七略,益昭美备”。他决定改变以往像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那样按韵分字编排的类书编纂方法,而命令“以经、史、子、集为纲目,裒辑分储”,逐一收录古今重要的图书典籍。次年,他为这部丛书取名为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丛书》的编纂,既响应了当时社会编纂“儒藏”的动议,也适应

了考据学辑佚古书的潮流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,《四库全书》缮录完成,贮藏于宫中的文渊阁。之后,乾隆帝命令再抄录六部,分贮于盛京文溯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避暑山庄文津阁、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、杭州文澜阁。然而,文化盛事的背后,是乾隆帝对于合法性论证的隐忧。乾隆帝在修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同时,却也大批禁毁图书,以捍卫满洲人统治的合法性。从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起,在皇帝授意下,四库馆臣陆续为皇帝查禁各类“违碍书籍”。所以,顾颉刚先生在为郭伯恭先生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所作的序言中指出,乾隆帝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之举,“寓禁于征”,使“珍闻秘笈之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”,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的又一次“书之厄运”。同时,乾隆朝针对违碍书籍的文字狱一再兴起,如屈大均诗文案、僧澹归著作案、袁继咸《六柳堂集》案等。对质疑满洲人统治合法性的思想进行压制的同时,重建满洲人认同意识是乾隆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另一重大举措:从1735年敕修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到1786年《八旗通志》修改完成。终乾隆一朝,乾隆帝似乎都在致力于满洲历史意涵的深刻思考。

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年届七十的乾隆帝命内务府御书处为自己镌刻一方闲章,文作“古稀天子之宝”。时年,朝鲜学者朴趾源来到中国,见乾隆帝“面白皙而微带黄气,须髯半白,貌若六十岁,蔼然有春风和气”。十一年后,另一位朝鲜人金正中是这样描述乾隆帝的:“面圆大如镜,鼻柱隆然,眼光炯若曙星,微有细须而或白,时年八十有二,而若五、六十岁人。”到1793年,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,时任副使的斯当东观察后写道:“自始至终,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,绝不像外间描写那样阴郁沉闷;他的态度很开朗,眼睛光亮有神。”这时候,乾隆皇帝已经八十三岁了。他本人甚至希望能够活过九十岁。然而,乾隆皇帝究竟没能捱到那个岁数,从康熙五十年(1711年)八月十三日诞于雍亲王府(今北京雍和宫),到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初三日以太上皇的身份逝于宫中,他仅活到虚龄八十九岁。五天之后,乾隆帝的宠臣和珅被逮捕,并在十天之后自杀。乾隆的继任者嘉庆帝以这样的方式向乾隆朝后期以来的腐败宣战,同时结束太上皇的训政,“向太上皇的幽灵夺权”。中国历史也将从此告别康乾盛世,告别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阶段的十八世纪,进入到内忧外患不断的十九世纪。